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精要

一、論文名稱：越南華人遷移史與客家話的使用-以胡志明市為例

二、作者：吳靜宜

三、獎助年度：99 年度

四、獎助金額：新台幣柒萬元整

五、研究過程(含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等)：

本研究以越南華族 (Dân Tộc Hoa) 中的客家人 (Người Họ) 為主要研究對象，以越南華人史作為研究的主體架構，去梳理客家族群在越南的遷移史，同時兼論客家族群與越南當地少數民族的關係，並探討客家族群從大陸原鄉遷移至越南與當地民族和不同漢語方言族群接觸後，在語言使用上所產生的變化，以及在越南統一前後當地政府的華人教育政策、華人社區中的語言競爭對客家話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本文採用的研究的方法，主要為文獻蒐集與實地的田野調查，透過書面的文字資料、田野的採訪紀錄與參與觀察。2006 年筆者通過校方「西遊記」遊學計畫的甄選，於 2006 年 9 月至 2007 年 7 月前後將近一年的時間至越南留學，並在當地實際進行文獻搜集及田野調查，先後曾居住及前往北越地區的河內、海防，南越地區的胡志明市、隆安省、堅江省的丐皮和美拖、同奈省富利社等地蒐集文獻及訪談當地學者，並透過越南籍師長與朋友的協助尋找華人同時進行採訪。此外，也前往位於中越邊境的老街省沙巴，至當地的少數民族市集作初步的了解與觀察。

文獻方面，筆者蒐集了越南、中國大陸、台灣、美國、加拿大等地有關越南華人、客家人移民史及客家話的書面及口述資料。諸如：透過河內社科院民族所、中國研究所以及胡志明市南部社科院的師長與研究員的協助，蒐集越南學者有關

越南華人研究的文獻資料。筆者同時也拜訪了越南胡志明市當地的華人會館，如客家幫的崇正會館、潮州幫的義安會館、福建幫的二府會館、海南幫的瓊府會館，獲得耆老們提供相關的文獻及口述歷史資料。並多次藉由拜訪崇正會館內耆老、參與弔喪的機會，觀察客家人在會館、喪事會場等公領域中溝通語言的使用。以及多次參與當地華人教會光中堂、平西堂、宣道會、潮語生命堂的主日崇拜，觀察及記錄教會所使用的書面語和口語，藉此了解各漢語方言族群在華人社區中語言競爭的強弱態勢。又承蒙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客家研究院的致贈有關廣西客家人遷徙越南的文獻資料，也透過台灣的「越南歸僑協會」及台北市「廣西同鄉會」的協助，蒐集了近代越南華人相關研究史料，以及訪談多位於越南統一前後返台定居的越南華僑。至於移居美加地區的越南華僑，則透過書信、電子郵件及越洋電話聯繫、訪談，華僑們也提供海外越南相關的研究文獻給筆者。透過這些不同區域所匯集而來的文獻資料與田野記錄，客觀地呈現與描述越南華人、客家人的遷移歷程以及客家話在越南多語言、多方言環境下所展現的面貌。

六、主要研究發現：

從本研究發現越南華族及客家族群的遷移，與中越兩國在近代歷史上幾次重要的戰役有關，而越南華族在越南歷史上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許多的貢獻。至於越南客家族群與當地少數民族，不管在北越或南越地區，往來十分頻繁，特別是與艾族（Dân Tộc Ngái）、儂族（Dân Tộc Nùng）的關係都非常密切。在語言方面，越南客家族群在僑居國多語言、多方言的語言環境下，借入不少漢語（國語、普通話、廣府話、潮州話）及非漢語方言（越語、英語、日語）族群的詞彙，即使是客家人群聚的大本營胡志明市，客家話依然受到廣府話詞彙、語音、語法結構性的滲透。此外，越南政府在統一前後的語言政策，使客家話的發展出現斷層現象，華人社區中激烈的語言競爭環境，也讓客家話的傳承出現了危機。

身為越南華族（Hoa）中的客家族群（Nguòi Hẹ）自母國移居異邦，與整個

華人族群的遷移史息息相關，而影響移民的原因十分複雜，包含了地理、經濟、政治、社會等因素。這些因素自然也對於客家人在越南境內的遷移產生作用，而遷移的路線與分布的區域，又牽動到客家人與週遭族群的關係，這些族群所使用的語言也連帶地對客家話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在地理上，中國南方的幾個省份因地利之便或海運發達，因此有相當多的居民透過海路、陸路的方式分別移民至越南北、中、南三個區域，其中以南部地區的華人人口數最多，特別是胡志明市佔了將近 60%。越南全境華人就原鄉省籍來看，以廣東與福建兩省居多。其中廣東、廣西、雲南與越南北部接壤，懸於南海上的海南島則鄰近越南中部，而福建省雖非與越南北部直接相鄰，但因海上貿易發展得早，更利於移民。因此他們或穿越中越邊界直接到達越南北部，或由海路方式往南到達越南的中、南部，其中瓊僑在中越地區，建立了不少據點，堪稱為越南瓊僑的大本營。

從經濟方面來看，中國海禁的開放及廿世紀初期法國為了加速殖民地越、東、寮的開發，為中國南方沿海省份的居民向海外發展提供了一個最佳良機，因此海上貿易與移墾南洋，也帶動了中國南方沿海省份的居民向海外發展的移民潮，其中至越南的福建、廣東兩省居民人數最多。福建省的漳州港、泉州港和廈門港，自宋至明、清時期逐漸發展起來，成為重要的南洋貿易商船中心；至於廣東省的廣州、汕頭，前者在唐、宋朝時先後作為接待外國使節的港口以及設立了市舶司，後者則在鴉片戰爭之後，也逐漸興起。這些臨海城市，後來均成為閩、粵地區重要的移民越南的重要據點。

在政治方面，中越近代史上的幾次戰爭，也誘發了華人幾次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對於華人的遷移有重大的影響。如太平天國之役，促使部分華人隨軍隊越過中越邊界進入北越地區；中法戰爭後兩國簽訂《天津條約》，中國將北崙江以南的中國領土劃歸越南，當地的華人原居民在政權轉移後，成了「越南公民」；國共內戰時期大陸各地百姓以海路、陸路等方式，進入南、北越地區躲避戰火，而黃杰及彭佐熙的部隊，也因戰況不佳，被迫自鎮南關進入北越地區，後又移送至

中越金蘭灣，再致富國島，1953 年才經由政府交涉成功後返台；法越奠邊府戰役、越南內戰及 1979 年的中越戰爭，也促使越南境內華人大規模地南撤、回歸中國大陸及遷往第三國。

在社會因素方面，不穩定的社會環境也是引發移民潮的重要誘因。地理環境條件的惡劣、可耕面積稀少，加上天災不斷，龐大的人口壓力，迫使廣東與福建兩省居民另謀出路，他們有些人透過海路方式到達台灣，有些人則搭船南下南洋地區，還有一部分的人則以陸路方式越過中越邊境進入越南。此外，在海禁開放之前，福建、廣東兩省地方吏治腐敗、境內族群之間的衝突等因素避難南洋。戰亂所帶來的動盪不安、民生蕭條，也是逼使居民不得不出走，如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之後，許多人為了餬口而成為列強覬覦的廉價勞工，被人口販子當成「豬仔」誘騙至南洋等地開荒，也促成了閩、粵兩地大規模的移民潮。

越南客家族群在華人遷移史的背景下，基本上的遷移情況大致相同，但也有其特色，包括原居地祖籍、移民原因、移民的年代及移民路線、方式。就筆者的訪談紀錄與蒐集的文獻，越南客家族群多來自粵東地區，移民年代最早自 18 世紀，最遲則於 1949 年前後移民至越南，而其移民原因最主要為謀生與避禍。移民路線及方式：北越地區的客家人多是經由陸路從廣西的東興進入越南砵街，或由廣西越過中越邊界進入越南諒山。中越地區的客家人則多透過海路方式抵達中越古城會安等地。南部客家人移民的路線與方式則最為多元，陸路方面有的是從大陸原鄉經由第三國、第三地來到南方，有的則是一路由北方南來；海路方面則從廣東汕頭、廣州搭乘不同船號的船隻直抵西貢。

中越近代幾次戰役中，對於客家族群的遷徙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在這些戰役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既是影響者同時也是受影響者，這些戰役有的是由他們所主導，有些則是他們參與甚深。如太平天國之役，起義者絕大部分為客家籍人士，如領軍的洪秀全以及其所冊封的楊秀清、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又如，中法戰爭由劉永福領軍的黑旗軍、曾國藩領軍的湘軍及馮子材領軍的士兵也多為客家子弟；1954 年的法越奠邊府戰役，也有相當比例的客家人參與其中。

越南客家人在當地與其他漢語方言族群相較起來，是個相當具有特色的族群，包括和當地的少數民族、華族中的廣府人及潮州人的關係，以及族群內部的組織型態。在越南 54 個民族中，客家族群與 Ngái 族、Ngùng 族的關係，一直是十分密切的。1954 年中法簽訂《天津條約》後，北崙江以南的中國領土歸殖民越南的法國政府管轄，法國政府在海寧省作族群調查後，命名了一個新的族群名稱「Ngùng」族，而當地原居民中有相當人數的客家人，因此與「Ngùng」族關係匪淺；另一方面 1979 年越南官方公佈的 54 個民族中的「Ngái」族，在河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Đại Gia Định Các Dân Tộc ở Việt Nam*”一書中提及，「Ngái」族在官方名稱之外的別名，有「Ngái Hắc Cá」、「Ngái Lâu Mản」、「Hẹ」等稱呼，而這些稱呼對應漢字為「客家 Ngái」、「流民 Ngái」，而越南南方人則稱客家人為「người Hẹ」；另根據越南學者 Phạm Đăng Hiến 的研究，北江省華人最集中的陸南、陸雁和山洞這三個縣的一些華人表示，佔北江省華人比例最高的陸雁縣，當地華人說的母語包括 Ngái 話、客家話及 Pava 話。這些文獻似乎都顯示著「Ngái」族與客家族群之間緊密的關係。

法國殖民、日本佔領及美軍駐紮越南，華人社區中多元的漢語方言族群，使得客家族群身處於多語言、多方言的複雜環境中，因此在南越地區的胡志明市的客家族群，在語言上也吸收了不少其他外語及漢語方言族群的詞彙。越南五大華人幫會中，客家幫與廣肇幫、潮州幫的關係較為密切，因此在語言上也出現與這兩個方言接觸後相融的痕跡。越南客家族群多來自粵東地區，與廣府人均源自廣東省，因此在北越地區河內市及海防地區僅有的福建會館和廣東會館之下，極可能加入當地的「粵東會館」或「廣東會館」；在中越地區的會安以及南越地區鵝貢省，客家人未成立自己幫會的會館之前，則是加入當地的廣肇會館，後來在廣肇幫另建會館後，仍沿用廣肇會館舊址作為客家會館。也由於這層關係，客家話與廣府話因接觸日深，而產生對母語的影響。至於客家幫與潮州幫的「潮客一家」的關係，在胡志明市特別顯著，這可從三個面向看出他們之間水乳交融的原因：一是客家幫、與潮州幫在原鄉均曾以汕頭作為遷移胡志明市的據點；二是客家

幫、與潮州幫曾合建義安會館，在會務上共同參與、生活瑣事上互相扶持；三是在語言方面，潮州話也是客家人對外溝通的重要語言能力之一，這些都顯示出潮、客幫會之間深厚的關係，也是客家話受潮州話影響的主要原因。

胡志明市客家幫的另一個特色是幫會內部成員的組織，客家幫的成員組織，在華人幫會中最複雜，對於客家人的定義也最為寬鬆。在法國殖民政府時期規定，華人登岸入越必須加入所屬籍貫的幫會，若無所屬幫會者則歸入客家幫，因此客家幫內除客家族群之外，還包括浙江、江蘇、湖北等非客籍的華人，再加上客家族群內部雖大多來自粵東地區，但彼此之間的腔調仍有頗大的差異，沒有優勢腔的現象，因此無論客家幫或客家族群內部無法完全使用客家話來溝通，必須選擇另一個大家都通曉的語言作為彼此的溝通工具。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是胡志明市客家話在傳承上所面臨到難題之一。

又根據筆者對 1958 年崇正總會出版的《越南崇正總會》的廣告文案的研究，以及 2007 年筆者在胡志明市的田野調查，都顯示廣府話已深入客家話的語言結構與客家人的日常生活。客家人的母語能力不管如何，幾乎人人會說廣府話，是當地客家人的重要溝通語言，甚至有部份客籍人士也能通潮州話，加上因應非客籍配偶的語言溝通需求，使得母語在家庭中使用的頻率降低；而不論媒體、學校、教會及戲劇演出，客家話也無公共發聲場域，也使得客家話在當地華人社區中的地位顯得更為弱勢，薪傳的工作更為艱鉅。此外，越南政府在越南統一前後，對於華人的語言政策，也使得客家話產生斷層及面臨薪傳的危機。

七、結論及建議事項：

東南亞地區的華僑是早期全球華僑人數最多的地區，而位於中南半島的印支三國（越南、寮國、柬埔寨）中，又以越南的華僑人口數居冠，該國與中國、台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關係也較為親近，而中越近代史上的幾次關鍵性的戰爭，牽動了中、越、台三方微妙的關係，也是影響近代越南華人遷移及在境內分佈的重要歷史背景。因此，對於越南華人歷史的了解，是認識中南半島上華

人歷史發展的重要窗口。

1979 年越南政府公佈境內 54 民族，華人被列入華族，而據越南官方出版的“*Đại Gia Định Các Dân Tộc ở Việt Nam*”（Nguyễn Văn Huy, Nguyễn Quý Thao, Lê Duy Đại, Vũ Xuân Thảo, 2006），美國地區出版的“*Người Nùng & Khu Tự-Trị Hải-Ninh Việt Nam*”（Hội Quân Cán Chính Hải-Ninh, 2007），中國大陸的〈儂族考〉（向大有，2005）及〈越南民族的識別與實踐〉（范宏貴，1997）等研究文獻，都顯示華族中的客家人與越南當地的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相當密切，特別是與 Ngái（艾）族和 Nùng（儂）族，這也表示越南客家族群在當地有其獨特性，值得再深入去研究它的語言文化。

1994 年台灣政府鼓吹的「南向政策」，促使台越兩地關係又再度熱絡起來，台商在越南投資的首選之地胡志明市，是越南華族、客家族群的大本營，台商的進駐增加了對精通中越文人才的需求，相當程度地帶動了當地華語學習的熱潮，也促使華人社區中的語言競爭更形激烈，當地的客家人，身處在族群眾多的移民國以及漢語方言複雜的華人社區，在語言競爭激烈的環境下，如何去維繫並傳承母語？也是致力推動保存在地族群語言文化的台灣值得關注的另一個焦點。同時，也希望在國內母語復興運動逐漸蓬勃發展的情況下，也能對於海外社會主義國家的客家族群的語言文化有所了解。